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5-0003-07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笔谈)

[编者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走势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以2015年为界,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经历了以供给学派为主,转向偏重凯恩斯主义的微妙变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针对这个问题,西南财经大学赵磊研究员组织部分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对此问题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是耶?非耶?留待公议。在学术上我党主张百家争鸣,本刊不持立场。

[关键词]新常态;发展模式;透支消费;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1

西方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下去了

吴宣恭

(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走势日趋明显,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7%,为25年来最低水平。我国经济总量庞大,在经历几十年连续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放缓也属正常,对GDP的回落不必过于担忧。问题在于,这轮经济衰退却是由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的:外贸出口受自身竞争力下降和国际经济不景气所累增速遽降,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众多社会矛盾凸显,国内消费水平徘徊不前,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技术创新力量不足,房地产泡沫持续虚高不下,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活跃而实体经济资金紧缺,投资规模缩减且回报率不断降低,就业压力沉重,加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市场欺诈、道德沉沦,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些对今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如不加以缓释或解决,经济增速还可能进一步减退。令人遗憾的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一些建议和措施,很难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经济日趋恶化的局面。

比如,有些学者漠视我国确实存在生产迅速增长与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看不到内需不振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导致的人民收入下降,而将扩大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大规模城镇化上。殊不知,城镇化是一个依托于产业化发展的自然过程,如果只靠行政支持,缺乏必需的产业聚集,是无法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故大众收入和消费水平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产生许多负面效应,如大量农民失去生存所依赖的土地、“城市病”丛生等。

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就业压力增大,保就业就上升为当前的要务。已见的解决建议之一是,避开国家大规模投资,以融资支持、税收减免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但是,小微企业多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范围小,竞争力微弱,抗风险能力差,存活周期短,倒闭率和失业率偏高;更何况,依靠小微企业只能解决少数人一时的温饱,无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使我国屹立于世界经济强国

[收稿日期]2015-06-28

[作者简介]吴宣恭(1930—),男,福建省晋江市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赵磊(1957—),男,黑龙江省伊兰县人,西南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戚桂锋(1972—),男,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讲师,博士,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叶劲松(1954—),男,重庆市璧山县人,四川化工高级技工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之林。解决建议之二是,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我创造就业机会。发动和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应是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化活动。因为个人势单力薄,缺乏必需的技术设备,所办企业绝大多数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不能掌握核心资源,无法在社会上形成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多沦为小微企业。

大量和惯用的建议是利用私有制的积极性去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但是,一些具体的措施会引发更多的矛盾,诸如实行“非禁即入”,广泛开放过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必将削弱国家对重要行业和产品的控制力,同时会减少国家的收入;推行混合所有制、绩优企业首先上路,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和利益的流失,不利于加强政府的监管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鼓励私人经营原为非营利性事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明显增加病患的负担,损及民生福祉;推行政府购买私人经营的社会服务,势必增大政府开支,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放开私人资本组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其资本炒作的弊病将大于融资便利带来的益处,松弛国家对至关重要的金融命脉的控制,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至于为了支持私有企业而普遍降低其税负,更是慷公家之慨,助富人之私,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不符。

这些做法不仅会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部门,而且也会使国民经济的重要、关键部门与公共产品部门退出竞争性部门,实际上是全面实行“公退私进”“社退资进”,其后果是只见私、不见公。如此而行,私有制经济占据的地盘愈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愈大,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愈加剧烈,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愈加突出,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愈加严重,当前的经济难题就无法缓解,更遑论解决了。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人奉为圭臬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使用过的模式,那就是采取西方行之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如雇佣劳动制度和公司制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现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获取尽可能高的企业效率,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值,在少数人迅速暴富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会发挥作用,取得一定的成效。因为,在改革起步阶段,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人民群众普遍贫穷,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给予人们一点希望和好处,都能调动其积极性,使生产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使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我国是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在大大增长了的经济总量之上,凭借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利用自有的或国外的不可再生资源,继续高速发展,让人民过上

像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已经不是时代所允许的了。我国经济难题频出,社会矛盾丛生,充分表明这种发展模式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不更弦改辙就谈不上经济和社会的伟大振兴。这是因为:

第一,从资源供应看,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人口第一大国迅速发展、普遍致富的需求。存量和产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历来都是世界各国争夺的最重要对象,竞争非常激烈。中国想要使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就需成几倍地发展生产,无论怎样强调资源节约使用,也要耗费比现在多出几倍的资源,这在国内显然无法实现充分供应。但是求助于国际市场,即使进口资源几倍涨价,要充分满足大量资源需求也困难重重。发达国家已经将一些重要资源视为禁脔(1990年G7就使用着全球能源的42.9%),决不会容忍中国与它们分享。某些美国议员不停地威胁要制裁中国对自然资源的争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资源贸易也有所忌惮。近年来,一些资源供应国被美国颠覆了,我国获得资源的途径被扰乱;有些国家则在美国的挑拨下,对我国在当地的开发采取不合作态度,中国企业屡受冲击;许多新兴国家也需要大量资源,迫切希望分得一杯羹。所以,我国如果继续坚持走这条道路,就要被迫加入一场巨大的资源争夺战,这对发达国家无异虎口拔牙,对发展中国家或后进国家而言,可能触犯众怒,这些都不利于处理好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无助于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从制度和生产组织看,追随西方的发展道路,建立的是以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所鼓励的是个人主义,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实行的是分散的经济行为,依靠的是不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少数人利用各种方式先富起来而多数人长期相对贫困,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继续这种发展方式,不能解决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也不能改变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发展悬殊的局面,更谈不上实现十几亿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三,从国际贸易看,我国的货物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有相当高的份额,国际市场无法继续支撑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发,复苏缓慢,正在进入相对低速发展时期,市场容量扩展有限,加之这些国家纷纷进行“再工业化”,影响了我国新兴产业产品的销路。发展中国家利用更低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形成强大的竞争力,与我国抢占市场。在这种新常态下,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兴起,我国要保持目前的国际贸易份

额已成难事,遑论扩大。因此,依靠国外市场支撑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传统道路越走越窄了。

第四,从生态环境看,我国急促在约1/9的国土上谋求跃进式发展,而听任中部、西部广大地域长期闲置(或者是资源掠夺),从而造成沙石遍地、风尘漫天、河流干涸、植被退化,并且逐步危及东部地区。这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不利于人类的健康生活,当前举国上下都看到这种灾害,开始想办法加以缓解。但是,如果不转换发展思路,采取根本措施,以往的办法只能治标,无法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更不能化害为利,将华夏神州改变为绿水青山、风和日丽的沃野,十几亿中国人民也就不能享有世界推崇的现代化生活。

所以,我国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终止这种非持续和非协同性的传统发展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亦即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多样化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逐步消除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矛盾,积极发挥国家组织经济的能力,充分利用巨大的人力资源和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大力开发可再生资源(而不仅是节约利用资源),尽力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完善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改善生态、资源条件,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持续的腾飞。

早在1980年代,中国社科院农发所邓英淘研究员就深感传统的发展模式不适合大象一般的中国,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通过访问大量专家,以及同水利部门座谈、研究,提出了改变中国经济环境的重大设想:利用以风能发电为主提供的电力,将西南高原相当于几条黄河的丰富水源提升至一定高度,使其跨越横断山脉和巴颜克拉山脉,引流到西北和北方,灌溉辽阔的沙漠、戈壁和长期干旱地区,造出相当于我国现有可种植地的百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他称为“再造一个中国”),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包括生物能源、生化制品的其他现代产业,提供充足的能源、生产资料 and 食物、日用品,解决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大量进口粮食的问题,同时从养育森林和草原、涵养水土、改变中西部气候入手,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生态环境。

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创新构思,既可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难题,又能造福子孙万代,使中华民族真正地实现和平崛起,因此可作为我国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试验形式或组成部分。

首先,它有利于解决当前许多难题,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产能过剩、生活消费不振、出口形势恶化、国外资源供应紧张、新增人口就业艰难、城市房价涨

势不止等。因为,西部调水造地主要是垦殖工程,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反而有助于消化积压产品;它纯粹是国内的自主行为,不依赖国外资源和市场,不与外国争利;它新造大片可用土地,能大规模提供建设和住宅用地,有利于各类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容易解决住房问题,抑制房价疯涨。

其次,我国之所以必须确定经济增长底线,最关键的是要保证必要的就业岗位,以维护社会稳定。西部改造工程能在广袤的地区开发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能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为劳动者提供极其广阔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收入,实现保增长和惠民生的根本目的。

再次,它能够真正地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多年来我国一直呼吁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总是难以实现,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拓宽视野,仍按传统的模式考虑问题,只在原来的产业结构中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整。西部调水造地的设想则高屋建瓴,是雄心壮志的改革,突破了旧的发展模式,从更高的层次上考虑国家的长远发展。实施这项工程,可能是全面改变我国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几十年来风沙肆虐北方,威胁京畿,我国也一直坚持固沙防沙活动,但成效小、成本大,有些地方还不得不节节后退,关键就在于缺水。水源不足,植被生物存活困难,更无法扩大繁殖面积。提调大量水源,灌溉沙漠、荒原,形成大片绿洲,改变地区气候,消除沙尘的根源,是根本改变北方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

最后,这个宏伟工程的实施必将更加充分地显示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和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它规模宏大,建设周期长,无法由个人单打独斗,私人资本也将因利小而裹足不前,需要国家投入巨资和宏大的组织工作。最适合从事这种大型工程的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该项工程建设过程中,公有制和集体组织将显现其独特的作用,也将通过实践探索出不同的有效形式。在千百万人共同缔造的新天地,必将出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平等互助、友好协作的大批新型劳动组织,消除因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西部调水造地工程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但决不是空想,凭借我国现有的条件,完全可以实现,理由是:

其一,我国具备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各种物质资料和技术。我国的风电、光伏产业,无论是在先进程度还是在制造能力上都居世界之首,产能严重过剩,因长年遭受欧美的关税制裁无法打开外销通道,

不如自己在西部使用,这样,在改造西部环境的同时,也可扶持风电、光伏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举两得。近年来我国兴建了大批闻名于世的巨大水电站和输电体系,显示出我国强大的堤坝建设和水电系统建设能力;我国已在很短时间内建成了大量超长隧道和特大涵桥,表明我国拥有高超的隧道掘进工艺和涵桥建造技术。我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钢铁、水泥工业和建筑机械制造业,产能也严重过剩,这些在西部开发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总之,在西部建设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在物质技术上完全没有困难,而且有助于解决旧的发展模式无法解决的产能过剩问题。

其二,我国拥有不少建设这一工程的人力技术条件。我国具有长期治理江河的历史经验;拥有不少建校多年的水利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了大批水利专家和水利工作人员;长期进行治淮、治黄和南水北调工程,兴建了许多大型、巨型水利电力工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水利工程队伍。这些都充分说明,实施西部调水工程,我国在人力技术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其三,我国具有雄厚的财力,能为这一水利工程

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我国持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既在国外购买不到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科技器材,也收购不了良好的企业和矿山,只能用于购买日益贬值的美国国债。其实,这些外汇完全可以用来购买西部改造工程所需的普通的建设资源。2008年世界发生金融危机后,我国启动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现在同样可以再次进行大规模投资,让这项宏伟工程尽快上马。

其四,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潜力巨大的经济制度和号召力强大的政治组织,有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发起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完全有力量动员和组织这场气吞山河的工程。

其五,中国人民具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改造自然、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思想支柱。红旗渠、大庆油田、“两弹一星”工程,都是依靠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在环境恶劣、设备简陋、器材不足条件下攻克的。只要拥有宏伟的目标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无论多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劳动条件,都阻挡不了我国向西部大开发进军的步伐。

意味深长的“透支消费”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表面上波澜不惊,甚至有趋于下行的压力。然而,“静如止水”的下面犹如“新常态”这个词所暗含的那样: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正在孕育着某种重大改变。在笔者看来,变化的看点,既不在于创新的层面(大数据、云计算、创客),也不在于结构的维度(大众创业、“互联网+”、“一带一路”、楼市股市),而在于政府对产能过剩的焦虑。最近,消费金融公司再次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其中蕴含着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变化,值得人们深思。

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会议指出,发展消费金融,重点服务中低收入人群,有利于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升级。会议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将原在16个城市开展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向消费者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信贷,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使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互补发展,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笔者建议,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要高度重视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其中的看点在于:发展消费金融由试点扩大至全国是一个创新。回溯历史,早在6年前,消费金融公司的横空出世就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创新”(严格说是模仿)为我们观察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

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样本。笔者6年前就曾撰文指出:“为了‘透支消费’,咱们政府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2009年5月12日,中国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8月13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在北京、上海、成都、天津四地择机成立为境内居民个人提供消费贷款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以金融手段提升个人消费,以适应政府的扩大内需战略。’”

对于消费金融公司的经济功能和现实意义,笔者当时做出了如下判断:“消费金融公司就是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

把储蓄率降成负数,这是对国人量入为出传统观念的公然挑战。说挑战有点夸张,因为《穷爸爸,富爸爸》早就给国人彻底洗脑,挑战的一方已经没有对手。如果横向比较,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看到消费金融公司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版的“次级贷款”。

与“激愤的价值判断”不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学界和社会对“透支消费”一片讨伐之声,比如,“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对于“透支消费”的历史必然性,笔者给予了充分理解,而没有纠结于道德评价。有人对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表示担忧,然而在笔者看来,不论你欢迎也好,忧虑也罢,“透支消费”在中国的展开是市场经济的宿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至于这个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主流经济学根本无法把握,因为它只能寓于马克思有关生产过剩的矛盾之中:其实,中国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推出消费金融公司,也是被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给逼出来的——既然不准“打土豪分田地”,你不让老百姓透支消费,你又怎样把越来越过剩的产品消化掉呢?

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将要发生某种转折的重大信号。中国终于要从“生产过剩”走上“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不过,中国这才刚上路,美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完了一个来回。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怪圈:一个“过剩”与“透支”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的怪圈。

6年前,当银监会在京、津、沪、蓉推出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之时,中国经济开启了从“生产过剩”走上“透支消费”的轮回之路;6年后,当宣布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之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由“产能过剩”正式转向了“透支消费”的历史阶段。

这倒不是说“过剩”从此不再,而是说,因为“过剩”,所以必须“透支”。问题是:既然“过剩”,你就“使劲消费”好了,又何须“透支消费”呢?人们当然需要“消费”,“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马克思)。如此奇异的生产逻辑,若不想被“过剩”给憋死,你不“透支”,又何来“使劲消费”?

不论官方怎么定义新常态,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向”,才是新常态的本质定位所在。

中国经济:三种主义、两种前景与一个正确选择

戚桂锋

(中共山东省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部, 山东 济南 250021)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向新常态转变的阵痛期,只有站在“主义”的高度才能看清为何转变、向哪儿转变、怎样转变,从而科学界定和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常态。毋庸讳言,1990年代以来,站

在“主义”的高度审视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三种主义了。当前要破解中国经济改革难题,走出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的深水区,构建新常态,关键仍然在于

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种主义。

一是新自由主义。1980年代初,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它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倡导推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在政治和文化上主张去科学社会主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去共产党化,从而形成完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力量的推动下深刻改变了世界。从1990年代始,在内外颠覆势力的配合下,新自由主义被引入我国并严重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乃至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向着资本主义调整的重大演变,造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均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成为中国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

二是凯恩斯主义。1920年代末,适应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它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私企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化,其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发挥国家这个理想总资本家的作用,把危机转嫁给老百姓,为资本家集团服务。然而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它根本不可能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之中,只能掩盖和造成更大的危机,最终还是靠二战转嫁了危机。2008年前后,受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被虚假包装的凯恩斯主义乘虚而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按照如上分析,凯恩斯主义不但不能解决还加剧了我国内需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为西方输送了利益,为新自由主义将国企彻底私有化提供了借口。

三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发表167年

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充分验证,社会主义国家如遵照该《宣言》进行建设和改革,就会取得巨大成功和成就;反之,则会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招致亡党亡国。当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改革,构建中国经济新常态,则问题和矛盾会迎刃而解。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转方式”,就是将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引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引导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调结构”,就是按照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以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抓手和切入点,以此带动分配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在扩大生产的条件下,实现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以发展中国经济。如此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问题就会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就会消除,中国经济就可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唯一正确的选择。随着经济基础的调整和巩固,上层建筑也会越来越牢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越来越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变成现实。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前途仍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种主义,如果任由西方忽悠,任由同属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误导中国改革,中国经济前景必将在黯淡中走向绝路,而在实践和比较中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则中国经济矛盾会迎刃而解,从而前途一片光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也会梦想成真!

从出口看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

叶劲松

(四川化工高级技工学校, 四川 成都 611130)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即内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时存在、时时起作用。这一矛盾既不能被掩盖,也不是靠顶层设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之类的话语就能压住的。这一

矛盾的尖锐化必将导致经济增长下滑乃至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中有充分表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贪婪、资

本间的竞争,会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会使劳动群众购买力增长受限(甚至负增长)。因此,由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生产增长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而放任自流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即放任资本家),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不安于缩减生产、不安于限制销售规模,而国内市场又不能容纳其生产能力,从而加强了资本主义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自由贸易、全球化等都只不过是掩饰资本主义内在深刻矛盾的说词。国外的苹果、三星就是这样。国内市场的容量越不能满足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扩张行为便愈加不可遏制,它们企图在国内外销售的产品便越多。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出口,主要是出口换汇、进口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不是为了占据国外市场。因为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并实行计划经济,不会产生内需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原则上不需要通过大肆出口来解决因内需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可是,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国外市场的地方,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国内市场,这些地方已经被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所支配,所以,增加出口以占据国外市场的竞争也格外激烈。结果,各国资本主义企业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不断尖锐化。世界上一方大谈自由贸易、全球化,另一方则以高关税(现在更多是反倾销等)来对付——当然,也可能一方在大谈自由贸易时,又大搞反倾销。这些是争夺销售市场斗争不断尖锐化的表现。

中新网2015年6月8日电:“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消息……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97万亿元,下降9.7%。其中,出口1.17万亿元,下降2.8%……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9.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7.8%。其中,

出口5.4万亿元,增长0.8%;进口4.07万亿元,下降17.2%;贸易顺差1.33万亿元,扩大2倍。”这既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也显示了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销售市场斗争的尖锐化,尤其在欧盟和日本分别通过以欧元和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来增加出口以实现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015年前5个月,我国对欧盟出口8465.3亿元,下降2.2%;从欧盟进口5233.3亿元,下降14.1%。同期,对日本出口3375.4亿元,下降11.3%;从日本进口3513.7亿元,下降11.2%。也就是说,我国从欧盟、日本的进口,以人民币计价均有较大下降。但考虑到欧元和日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稳定,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从2014年初到2015年初一年时间里跌幅超过20%,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100日元兑人民币已经从7.5元下跌至现在的5元,跌幅超过30%),如以欧元或日元计价,我国从欧盟、日本的进口实际上有小幅增长,即我国对欧盟、日本的出口以本币计价有所下降,欧盟、日本对华出口以各自本币计价是略有增长。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几个月的出口情况不太好并不表明以后出口就一直不太好。是的,以后出口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在西方竞相扩大出口以缓解生产过剩的上百年历史中,有哪一个西方国家摆脱了生产过剩危机?没有!因此,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企图用加大出口来摆脱生产过剩危机,注定要失败。资本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生产过剩危机,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仅仅依靠“顶层设计”是不能消灭其生产过剩危机的(最多只能延缓这种危机),当年“马歇尔计划”带动的出口未能消灭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同理,我国的一系列出口战略在各国资本主义企业争夺国内外市场日趋尖锐的背景下也不能达到消化我国生产过剩的目的,唯有扩大内需,才是根本出路。